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青年返乡创业：机遇、挑战和推进思路*

郑兆峰[1]，胡 祎[2]

（1.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杭州 311121；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青年返乡创业是破解农村缺人才、缺产业困境的重要途径。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迎来新的契机。文章旨在厘清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青年返乡创业的发展机遇、当前涌现的主要创业形式和面临的挑战。分析表明：片区化抱团发展中，政策集成能够提高创业能力，要素整合能够丰富创业资源，区域联动可以创造创业机会，共建共治可以优化创业环境。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涌现出多种形式的创业新形态，但也面临片区功能定位失准与多变带来的制度性风险、利益联结机制不合理导致的创业根基不稳、片区数字化平台应用中的能力约束问题、片区公用品牌使用中的假冒侵权困境等多重挑战。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青年返乡创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围绕强化片区规划引领与法治保障、创新片区利益联结与治理模式、加强片区内数字技能培训与平台适配、构建片区品牌共治与协同保护体系持续发力。

关键词：片区化发展；乡村振兴；青年；返乡创业

中图分类号：F279.2；F24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89(2026)01-0044-11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在《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上，增加了“片区化推进”的内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和村庄空心化不断加剧，单个村庄规模小、资源散、人才缺问题突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指的是以若干位置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联的村庄组成片区作为单元统一规划、统筹政策、整合资源，推动产业连片发展、环境连片整治、组织连片共建，依靠强村带弱村实现共同发展①。这是党紧扣当前农村发展实际，顺应未来农村发展趋势作出的新部署安排，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返乡创业是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抓手，青年是返乡创业的“生力军”，青年返乡创业对于打造农村发展新引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1-2]。相较于以传统种养、小型加工为主，依赖经验和体力的返乡农民工群体，青年返乡创业者大多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前沿的市场视野、较强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更善于捕捉消费升级趋势，能够推动“农业+文旅”“农业+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3CJL013)。

作者简介：郑兆峰，讲师，研究方向：乡村人才振兴，农村创业。

通信作者：胡祎，编辑，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乡村人才振兴。

① 参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学习出版社，2025年，第94页。

电商”“农业+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落地。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大学生、城市白领等返乡创业。截至2025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 200万人②。但整体而言，青年返乡创业规模仍然较小，单一村庄“小散弱”局面难以充分激发青年群体返乡创业的热情。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部门力量在片区内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实现更充分共享，产业发展获得更大空间，青年返乡创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要注意到，片区化模式可能存在片区规模不合理、利益分配和联结机制不完善等问题[3]，将成为返乡创业青年面临的巨大挑战。

既有文献对返乡创业的机遇、挑战和推进路径等进行了大量研究[4]。机遇方面，郑风田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质量兴农要求提高农产品质量，为农民开展农产品加工提供了机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污染治理为农民创办农家乐等创造了机遇[5]。郭凯凯和高启杰研究表明，产业基础日益牢固，各类惠农政策与项目相继落地，城乡“双循环”电商市场融合发展，为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6]。挑战方面，韩俊和崔传义提出办事难、融资难、用地难是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突出问题[7]。周宇飞认为，创业经验缺乏、创业意识不足、资金筹措困难、应对风险能力有限是大学生返乡创业面对的主要困境[8]。推进路径方面，已有研究指出，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坚持分类施策，制定差异化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加强宣传，发挥典型榜样的示范作用等是促进返乡创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9]。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借鉴，但均未关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创业生态的变化，及其所引发的青年群体创业机会识别、资源拼凑和价值创造过程的转型。这导致既有文献对片区化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机遇的理解过于笼统，对潜在挑战的预见性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将厘清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发展的机遇、在实践中形成的主要创业形式以及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推动青年返乡创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主要机遇

根据Timmons创业模型，创业者、创业资源、创业机会是创业活动的基本要素[10]。近年来，学者普遍认为创业环境也是影响创业涌现的重要因素[11-12]。本文结合Timmons创业模型和创业环境理论，从创业能力、创业资源、创业机会、创业环境四个方面考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为青年群体带来的返乡创业机遇。

（一）政策集成提高创业能力

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政策支持的方向与效能发生转变，不再是对单一村庄、单个创业者的分散支持，而是通过将多个村庄整合为统一规划、协同发展的片区单元，实现政策资源的集约投放、服务体系的系统集成以及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

首先，片区化模式实现了政策资源的集中投放与精准滴灌，有效提高支持政策效能，吸引青年创业人才集聚。片区化模式通过顶层设计，整合原本分散于多个行政村的财政、土地、金融等支持政策，在片区内形成高密度的政策供给。政策集中发力极大地提升了政策的普及性与吸引力，引导创业者和资本向片区聚集。例如，浙江省为推进片区发展，对“四链”融合集聚区试点县市予以最高5 000万元的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资金奖励③。杭州市萧山区明确，每年安排100亩建设用地指标用于乡村产业发展，优先支持青年人才返乡入乡创业项目建设。这种高强度、可预期的资源承诺，为创业者提供了清晰的投入回报预期，有效吸引了大量青年人才。山东省济宁市在全市308个乡村振兴示

② 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我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200万人》，参见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2/content_7005385.htm。

③ 资料来源于农视网：《浙江：“四链”融合激活乡村人才“一池春水”》，参见https://www.ntv.cn/content/1/555/991555474.html。

范片区推行“合伙人”模式，累计招募合伙人1 031人，落地项目725个，正是政策集中发力吸引要素集聚的生动体现④。

其次，在片区层面，政府能够构建一体化、便捷化的创业服务体系，大幅降低创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创业主体运营和生存能力。新制度经济学指出，清晰的规则与高效的服务能显著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费用[13]。片区作为一个被明确界定和重点管理的区域，为政府推行“一站式”服务改革提供理想单元。政府可以系统整合市场监管、税务、人社等部门力量，实现“一次办”“一网办”。例如，浙江在全省建设1 157个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提供一站式服务⑤。这种服务的集成，将创业者从此前多头奔波、手续繁杂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将更多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技术、产品与市场，有效提升了青年返乡创业的效率和成功率。

最后，片区化模式带来人才在空间上的集聚，能够产生人力资本外部性与知识溢出效应，是提升创业者能力的内在引擎。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的非竞争性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14]。片区化模式通过产业集聚和平台建设，将企业家、技术专家、电商能手等各类青年人才聚集起来。这种集聚促进了非正式的交流、模仿学习和思想碰撞，形成了“干中学”的浓厚氛围[15]。例如，浙江省建德市寿昌镇的“十里寿昌江”片区，汇聚53支创业团队，形成从研发、种植到加工、文旅的完整链条，实现不同领域知识和技术的交叉融合③。宁波市镇海区的“甬江十里”示范带，将多个行政村的各类创业业态串联成片，创业者之间相互启发，共同升级业态⑥。在这种环境下，新加入的创业者不仅能获得政策红利，更能快速融入一个知识共享、经验互鉴的“学习型社区”，其市场洞察、管理技能和创新能力将在互动中得到提升，从而形成“人才吸引人才、人才培育人才”的良性循环。

（二）要素整合丰富创业资源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机制在于实现生产要素在特定空间内的系统性重构与高效率配置。传统的单一村庄发展模式中，受行政边界和资源规模限制，创业主体普遍面临生产要素“碎片化”困境，导致单个村庄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和完整的产业生态，严重制约创业活动的涌现与发展。片区化模式则通过打破行政壁垒、统筹规划布局，在更广阔的区域尺度上对土地、资本、人才、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进行重组和优化。这不仅显著提升了资源的边际产出效率，更为青年返乡创业者构建了一个资源更加丰富、获取成本更低、支撑体系更完备的创业资源供给平台。

一方面，片区化模式通过空间重构与统筹规划，能够盘活乡村土地资源，为创业项目提供空间载体。当前，青年返乡创业仍然受到土地碎片化和农业设施用地指标紧张的制约。土地碎片化导致规模化经营难以实现，返乡创业者自身出面流转土地又面临协调成本高、流转期限短且不稳定等问题。许多农业创业项目不仅需要集中连片的耕地，还需配套建设农机库房、玻璃温室、设施大棚等生产设施，在单村模式下，建设用地指标分散、农地细碎化，难以满足现代农业产业项目对连片土地的需求。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能够实现跨村整体规划与整合，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要素支撑。例如，重庆市在试点中探索形成“指标池”机制，将各村闲置宅基地腾退产生的用地指标统一管理、调剂使用，为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等项目提供用地保障，使得此前因创业空间不足而搁浅的创业梦想得以实现⑦。

---

④ 资料来源于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济宁市创新推行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 激活片区资源人才赋能成效显著》，参见https://hrss.shandong.gov.cn/articles/ch00304/202509/f58e54c0-eaf6-4871-a8ac-7bc697f69d60.shtml。

⑤ 资料来源于人民网：《浙江加速推动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参见http://zj.people.com.cn/n2/2025/0826/c186327-41332813.html。

⑥ 资料来源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城乡融合 产业多元 人才汇聚 镇海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答卷”》，参见https://www.zh.gov.cn/col/col1229626764/art/2025/art_1be20813185f4503a84e733ee0f05502.html。

⑦ 资料来源于重庆市人民政府：《破界：12村庄试水整合资源协同发展 我市探索村庄规划统筹引领巴渝和美乡村建设》，参见https://www.cq.gov.cn/ywdt/jrcq/202506/t20250606_14689346.html。

另一方面，片区化发展通过创新组织模式与利益联结机制，拓宽了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来源，为创业活动提供了更充足的资金支持。资本是创业的血液，单村经济体量小、信用基础弱，难以获得充足的信贷支持，也难以吸引大规模的社会资本投资。片区化模式通过组建“强村公司”“共富联合体”等市场化运营主体，将多个村的集体资产、资源打包，形成更具规模、更稳定的投资标的和信用联合体，显著增强了融资能力。浙江的金义新区“八仙积道共富带”，由区属国企投资建设，并成立由村集体、投资方、运营公司共同参与的共富项目运营公司，实现了国资引领、集体入股、村民受益的联动格局。与此同时，政府和金融机构也针对片区推出定制化金融产品。浙江省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2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片区发展，单个片区最高可获得8 000万元补助。金融机构则创新推出“片区共富贷”“农创担”等专属信贷产品，2025年以来为创业者提供超过426亿元的创业贷款支持。这种由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资本整合模式，有效缓解了青年返乡创业者面临的初期融资约束③。

（三）区域联动创造创业机会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了乡村产业发展单元从行政孤立的村庄，到功能互补、经济关联的区域升级。这种空间组织的变革，通过地理集中与功能分工，催生出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网络效应，从而拓展了青年返乡创业的机会边界。

首先，区域联动能够催生产业集群，为创业者提供在专业化分工中寻找创业机会的空间。根据产业集群理论，地理上集中、相互关联的企业能够产生显著的竞争优势[16]。片区化模式通过统筹规划，整合多个村庄的同类或关联产业资源，形成规模化的原料基地、加工园区或市场集散中心。例如，浙江省推动的“一县一业”发展模式，在片区化模式中进一步细化为“一片一链”，形成安吉的“白茶产业示范带”、诸暨的“珍珠产业联动区”。在这种集群中，青年返乡创业者可以高度专业化地聚焦于产业链的某一个优势环节，如从事种苗研发与培育、无人机植保、智慧灌溉，或是开展电商直播、社群营销业务。集群带来的信息、技术、知识快速流动，大大降低了创业者学习成本和试错风险，使其能快速融入产业网络并找准创业领域[17]。

其次，区域联动能够加速三产融合，为创业者开辟“农业+”体验经济的全新赛道。单一村庄的资源承载力有限，难以支撑需要多要素组合的文旅、康养、研学等融合业态。片区化模式则通过基础设施互联、景观风貌共塑、品牌形象统一，将分散的田园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串联起来，打造出具有承载力和吸引力的区域性消费目的地，为青年群体提供从“卖产品”转向“卖体验”“卖服务”“卖文化”的创业机会。例如，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依靠多个村庄联动，分别发展精品民宿、户外运动、艺术展览、有机农业等业态，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品质的乡村生活体验区。青年返乡后可以在这里开办主题民宿、乡村咖啡馆、非遗工坊、自然教育营地或田园综合体等高附加值业态。

最后，区域联动通过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和数字化服务平台，赋予了青年创业者直接对接大市场的能力，创造了平台赋能型创业机会。单一村庄发展模式下，创业者打造独立品牌缺乏有效支持。片区化模式则能够集中资源打造一个覆盖全域、价值清晰的区域公共品牌，并建立严格的质量标准和溯源体系。这在实质上是为小微创业者提供强大的“品牌租赁”服务，能够大幅降低青年创业群体的市场进入门槛。例如，浙江省遂昌县搭建“遂昌仙侠”区域电商平台，整合全县农特产品，使分散的农户和创业者都能通过这一平台进行标准化销售。不仅如此，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还催生了新的创业形态，如为片区提供全域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的技术服务商、运营片区农产品直播矩阵的MCN机构、开发沉浸式AR乡村导览体验的内容创作者等。

（四）共建共治优化创业环境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片区内统筹推进建设和治理，构建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利益共同体，以集体协商和联合投资的方式，提供了更高质量、更具规模效应的公共产品，为创业者营造更好的创业生态。

首先，基础设施的同标同质与互联互通，直接降低了创业的“硬性”运营成本与市场准入门槛。传统村庄各自为政，道路、管网、通讯、物流等基础设施存在标准不一、衔接不畅、重复建设等问题，增加了创业项目的物流成本、信息成本和建设成本。片区化模式通过统一规划、集中投资，推动基础设施跨村连接、标准统一。对于青年返乡创业者而言，其创办农场、工厂或民宿可以享受与城市接近的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原材料与产品的运输更加高效低价，网络信号稳定保障了电商直播与远程协作，统一的污水与垃圾处理系统降低了环保合规成本。特别是冷链物流、仓储中心等设施的共建共享，使得生鲜电商、农产品加工等对供应链要求高的创业项目能够在乡村落地。

其次，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有效降低了青年返乡创业者的生活成本与后顾之忧，提升了乡村对青年群体的长期吸引力，是优化创业“软环境”的核心[18]。创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创业机会，也取决于创业者及其团队能否在乡村实现安居乐业。长期以来，农村缺乏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成为阻碍青年群体长期扎根乡村的主要难题。片区化模式通过整合资源，在片区中心村或交通节点集中布局区域性公共服务设施，返乡创业青年能够更加便捷地享受公共服务。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探索的“15分钟公共服务圈”，旨在让片区内任何村庄的居民都能在15分钟内享受到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⑧。这对于携带家庭的青年创业者而言，意味着子女教育、家人就医等问题得到保障，可安心、长期地投入创业事业。

最后，共建共治下的文明乡风催生了开放、信任、合作的创业文化，为创业活动提供了非正式制度支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中的“共治”，是指通过联合议事、制定村规民约、共同开展文化活动等方式，塑造一种超越本村、更具包容性和开拓精神的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减少创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邻里纠纷、地方保护主义等社会摩擦。这种良性的社会氛围使得青年返乡创业者更易被本地社区接纳，也促进了本地村民与创业者之间的知识交流、经验分享和业务合作。乡土文化认同与现代化的创业精神相结合，能够催生出独特的区域品牌文化和创业生态，从而形成市场竞争中的独特优势。

三、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创新形式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通过将地域相邻、资源相似的多个村庄整合为统一规划、协同发展的共同体，改变了乡村经济与社会的空间组织结构，也创造了单村模式下无法产生的创业新业态，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四类。

（一）深度嵌入区域产业链的“价值共创者”

片区化模式能够将原本分散、同质的村庄产业升级为区域产业集群。对于青年返乡创业者而言，此时可以嵌入区域主导产业链的特定环节，从而降低市场风险与创业门槛。在实践中，这种嵌入表现为高度的专业分工与功能互补。创业者可以根据自身资本、技术或市场渠道方面的优势，选择深耕于产业链的某一环节。例如，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的八都岕银杏片区，五个村庄联合发展银杏产业，内部形成了明确分工。部分村庄专注于银杏古树的保护和观光核心区运营；部分村庄利用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或银杏果的初级加工；部分村庄则引入社会资本，开发银杏面、银杏酒等精深加工产品，并配套发展民宿、餐饮等服务业⑨。在这个产业链中，创业者可以是专注于银杏盆景培育的技术能手、运营民宿集群团队或专门为片区农产品开展电商直播的营销公司。山东省淄博市源泉镇的猕猴桃产业基地同样如此，通过片区委领办联合社，整合了分散在12个村的产业，为创业者提供了从种苗、

⑧ 资料来源于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宁波江北：构建覆盖城乡“15分钟公共服务圈”》，参见https://www.agri.cn/zx/xxlb/zj/202512/t20251222_8796647.htm。

⑨ 资料来源于中国网：《浙江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念好共建共赢“致富经”》，参见http://news.china.com.cn/txt/2025-12/04/content_118210594.shtml。

技术服务到品牌营销的全链条支撑平台，使个体创业项目能够借助产业高地的东风快速起步⑩。

（二）主导片区整体运营的“专业服务商”

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多个村庄的闲置农房、集体建设用地、生态文化资源等打包整合，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但运营复杂的“资源资产包”。如何将这些资产市场化盘活并产生持续收益，催生了对专业化、职业化运营团队的需求，以及“乡村运营师”或“乡村CEO”等新的创业形式。青年返乡创业者需要运用现代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资本运作理念，对片区进行整体策划、品牌打造、招商引资和持续经营。这类创业的核心不再是拥有资产，而是输出智力和管理能力，而这恰恰是青年群体的优势。其可通过签订委托运营协议、成立合资的“强村公司”或“共富公司”等方式，获得片区资源的整体或部分经营权。例如，浙江省安吉县“大余村”片区成立景区管委会进行统筹规划运营，并聘用职业经理人，确保24个村“一村一品”、错位发展，共同构建四季旅游生态。2024年，余村接待游客122万人次，实现集体经济收入2 205万元，经营性收入1 131万元。杭州市余杭区“禹上稻乡”片区，以永安村为核心联合周边8个村，共同委托一家专业经营管理公司进行统一运营，打造“稻乡综合体”“稻上学堂”等系列项目，让稻田衍生出教育、旅游等多重价值⑨。

（三）开拓“乡村+”融合新业态的“生活提案者”

片区化模式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人居环境整体提升，塑造了大量消费新场景。这有助于创业者打破传统农业或旅游业边界，开发“乡村+文创”“乡村+康养”“乡村+研学”“乡村+艺术”等融合新业态。这类创业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准捕捉都市消费升级的需求，将乡村的“绿水青山”和“乡愁记忆”转化为可消费、可传播的美好生活提案。这要求青年返乡创业者在外出工作期间培养较强的文化感知力、创意设计能力和内容生产能力。在浙江省，这类实践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桐庐县将5个古村落“串珠成链”，打造以“六古”为特色的文化遗产村落综合体，吸引各类文创工作室和主题民宿入驻。建德市千鹤红片区则以红色基因为内核，发展低空观光、农耕研学等新业态。这些新业态的附加值远高于农产品销售，是青年返乡创业的理想选择。这些创业项目不仅能够实现自身盈利，还能与片区主导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做大消费市场，让乡村从“卖产品”走向“卖风景”“卖文化”“卖体验”，实现乡村价值的再创造。

（四）引领数字与科技赋能的“创新驱动者”

片区组团发展中，掌握相关技能的青年群体可以开展技术赋能型创业，成为驱动片区产业升级的创新引擎。这类创业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应用数字技术重塑传统产销链路。例如，创业者可以为整个片区提供农产品溯源系统、智慧物流调度平台、区域性电商销售矩阵或社群营销网络等的开发与运营服务。二是提供专业化的生产性科技服务。包括智慧农业解决方案，如无人机植保、物联网监测、水肥一体化、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等。此类创业项目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对青年群体的技术素养要求较高。由于能够直接帮助片区农业降本增效、提质扩容，这类创业项目往往能够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如浙江省为技术赋能型创业项目提供“定额+激励”支持，并配套“青创贷”“农创保”等金融产品。对于科研人员、高校毕业生和拥有数字技能的青年而言，在片区化模式提供的应用场景和政策支持下进行技术创业，是将知识转化为财富、参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四、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片区化模式为青年返乡创业开辟了广阔空间，但作为新兴乡村发展路径，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系

⑩ 资料来源于大众网：《从“单村独斗”到“片区协同”》，参见https://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50923/Articel06003MT.htm。

列挑战。这些挑战来源于制度设计、利益协调、技术应用与市场环境等多个层面，若处理不当，不仅制约青年群体创业活力的释放，还可能消解片区化协同发展的潜在红利。

（一）片区功能定位失准与多变带来的制度性风险

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科学、清晰且稳定的功能定位是发展的基石，决定资源投入方向和产业聚合形态。但在青年群体开展创业活动所依托的片区存在定位脱离实际或朝令夕改的问题时，将面临难以抵御的制度性风险。这种风险超越了寻常的市场波动，直接动摇创业投资的长期预期和生存根基。不合理或缺乏连续性的功能定位，导致片区发展犹如无舵之船，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集群和配套生态。例如，一个缺乏独特文旅资源的农业片区，若盲目对标成功案例，将主导产业定位为“高端民宿集群”和“大型主题乐园”，并据此开展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创业者基于此规划投入重金，最终可能因客源匮乏、运营成本高昂而导致失败。此外，片区定位的频繁变化也可能导致创业活动陷入困境。部分片区在发展过程中，因负责人更替、政策风向转换或追求短期亮点，主导产业在“农文旅融合”“科创田园”“康养小镇”等概念间摇摆不定。这种因顶层设计摇摆导致的非市场风险，让创业者无所适从也无计可施，严重抑制社会资本长期、重资产投资的意愿。

（二）利益联结机制不合理导致的创业根基不稳

片区化模式持续发挥效能的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组织模式，将分散的农户、村集体、创业者及社会资本联结成“发展共同体”。其中，公平、透明且可持续的利益分配与联结机制是维系共同体的社会契约。若此机制不合理，创业项目即便产品优质、市场广阔，其生存根基也会因内部利益冲突而动摇，最终可能导致共输局面。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通常表现为两种极端：一是企业独大，农民边缘化。即提供土地、劳务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农户仅能获得固定的租金或工资，无法分享发展红利。这种模式下，农户缺乏提升产品品质、维护区域品牌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因心理失衡而产生抵触行为。二是平均主义，在合作社或联合体内部，收益分配未能与资源投入、劳动贡献有效挂钩，导致“搭便车”现象普遍，挫伤关键成员的积极性。例如，华东某县著名的“荷花荡”乡村旅游片区，初期由能人牵头，联合周边五个村发展观光业，收入按各村人口简单平均分配。但一段时间后，位于景区核心、投入资源最多、承担主要接待任务的中心村认为利益分配制度不合理选择退出，导致景区完整性被破坏，品牌价值下降，所有参与方利益受损。因此，利益分配若无法精准反映各方的资源投入、风险承担与实际贡献，便会形成“激励不相容”的困局，导致关键参与者丧失积极性，创业活动根基受到破坏，返乡创业者遭受严重经济损失。

（三）片区数字化平台应用中的能力壁垒问题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统一的区域互联网数字化平台成为整合资源、对接市场、提升管理效率的基础配置⑪。然而，这些旨在赋能创业的工具，在实践中却衍生出数字鸿沟的问题，对文化水平较低的青年返乡创业者的数字素养提出三方面挑战。一是“会用”的挑战。不少数字化平台功能复杂，从产品上架、详情页优化、流量推广到在线客服、数据分析，每一步都需要专业知识。例如，参与一次平台购物节促销活动，需要创业者精通活动规则、库存管理、物流协调和应急客服，许多青年返乡创业者因能力不足而望而却步。二是“用好”的挑战。数据是数字化平台的核心资源，青年返乡创业者要能从平台后台的销售数据、用户画像中洞察消费趋势，指导选品、生产和营销。但现实中，不少创业者缺乏数据分析和运营能力，无法将流量有效转化为品牌资产和客户资源。三是“防险”的挑战。数字化平台的发展也给青年返乡创业者带来诸如网络安全威胁、个人隐私泄露、平台算法规则处罚等潜在风险。缺乏数字素养的创业者易成为受害者，或因触犯平台规则而被处罚，导致经营中断。

⑪ 资料来源于中国农网：《为什么以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参见https://szb.farmer.com.cn/nmrb/html/2025/20251213/20251213_5/nmrb_20251213_13181_5_1999595468124950589.html。

（四）片区公用品牌使用中的侵权困境

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是片区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能够为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创业者提供强大的品牌背书和溢价空间。但品牌声誉愈高，其作为公共物品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风险也愈大，其中最突出的挑战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侵权。这对于守法经营的青年返乡创业者构成了严重的市场侵害。当市场上充斥大量假冒伪劣商品时，消费者的信任将被严重透支，导致品牌声誉受损，整体市场价格被拉低。事实上，农产品“蹭名牌”现象由来已久，部分知名度较高、溢价能力较强的农产品品牌被侵权现象频发。例如，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年产量仅约1万吨，但市场上每年以该名号销售的螃蟹超过10万吨，侵权产品泛滥成灾。对抗侵权行为，青年创业者个体往往力不从心。假冒产业链条复杂，从生产、包装到销售网络化、跨区域运作，单个创业者维权面临取证难、成本高、周期长、地方保护等多重障碍。更多时候，只能被动承受市场份额被蚕食和品牌信誉被连带损害的后果。这不仅导致青年返乡创业者无法完全获得品牌溢价带来的增值收益，更挫伤其保持品质、维护品牌的长期动力。为了生存，部分创业者甚至被迫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五、促进青年返乡创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面对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者面临的功能定位失准、利益联结松散、数字能力不足、品牌保护薄弱等现实挑战，亟须立足片区化模式“统筹规划、资源整合、连片发展”的核心特征，构建“规划引领—利益联结—数字赋能—品牌共治”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切实将片区化模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青年返乡创业的实践动能，推动创业活动与片区发展深度融合、良性互动。

（一）强化片区规划引领与法治保障，稳定青年创业长期预期

片区功能定位的科学性与稳定性是确保青年返乡创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必须破解“规划跟风、朝令夕改”的制度性风险，为创业者提供清晰、可预期的发展方向。一是构建片区资源禀赋与产业定位精准匹配机制。由县级政府牵头，组建包含农业经济、城乡规划、市场营销等领域的跨学科专家团队，对片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需求进行全面普查与评估。在此基础上，结合片区“产业连片、环境连片、组织连片”的发展要求，确定与本地比较优势相契合的主导产业方向，避免不同片区之间出现同质化竞争。例如，耕地连片的片区可定位为现代农业产业区，生态资源丰富的片区可定位为农文旅融合发展区，邻近城镇的片区可定位为农产品加工与物流集散区。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对产业定位的可行性进行独立论证，确保规划既符合乡村发展实际，又具备市场竞争力。二是推动片区规划的规范化与多规衔接。将片区发展规划纳入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与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深度衔接，明确片区内产业布局、建设用地指标、基础设施建设等核心内容。通过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建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刚性约束机制，杜绝因地方政府负责人更替或短期政绩诉求而随意调整规划的现象。三是建立规划调整预警与创业损失补偿机制。设立片区规划调整预警制度，若非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不得擅自变更主导产业定位与空间布局；确需调整的，必须提前3个月向社会公示，并组织创业者、村集体、农户代表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针对因规划调整导致的合规创业项目损失，由县级财政设立片区创业风险补偿基金，按照项目实际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或为创业者提供新的创业场地、技术指导、市场对接等替代性支持，以政府诚信筑牢青年返乡创业的信心根基。

（二）创新片区利益联结与治理模式，筑牢青年创业合作根基

利益联结机制是片区化模式下的核心纽带，必须打破“企业独大、农户边缘”或“平均主义、激励不足”的困境，构建多方共赢的发展共同体。一是培育片区层面的市场化运营主体。在片区内组建由县级国资平台、乡镇集体、村集体、核心青年创业主体共同持股的“片区共富运营有限公司”，作为片

区资源整合、产业发展、利益分配的核心载体。明确运营公司的股权结构及主要职责，运营公司负责片区的统一规划、招商引资、品牌建设、基础设施维护等工作，实现片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与高效利用。二是构建复合型利益分配与激励机制。推广“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绩效奖励+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模式，确保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满足。具体而言，农户以土地经营权、闲置农房等资源入股，可获得不低于当地土地流转均价120%的保底收益，同时根据运营公司年度盈利情况参与二次分红；青年创业主体凭借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等核心要素入股，享有项目经营自主权，其收益与创业项目的营收、带动就业人数、农户增收幅度等绩效指标挂钩；村集体通过资产入股获得的分红收益，提取40%用于片区内道路、供水、污水处理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30%用于农户的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30%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当创业项目面临亏损时，按照股权比例分摊损失，避免将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青年创业者。三是健全片区创业治理的多方协商机制。在运营公司内部设立“片区创业治理委员会”，成员由村“两委”代表、农户代表、青年创业主体代表、专家顾问组成，负责审议运营公司的年度经营计划、利益分配方案、重大投资决策等事项。建立常态化的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协调解决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利益纠纷、资源调配等问题。通过制度化的协商与监督，真正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三）加强片区内数字技能培训与平台适配，突破青年创业能力约束

针对“平台功能复杂、创业者数字素养不足”的问题，要推动数字化红利普惠广大青年创业者。一是搭建片区一体化数字创业服务平台。由县级政府与电商平台、通信运营商合作，开发集“产品溯源、电商销售、物流调度、数据分析、金融服务”于一体的片区数字创业服务平台，强化平台功能与产业发展需求的适配。针对农产品种植片区，开发物联网监测模块，实现土壤墒情、作物生长状况的实时监控；针对农文旅融合片区，开发智慧旅游模块，提供在线预订、智能导览、游客数据分析等服务；针对农产品加工片区，开发供应链管理模块，实现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销售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同时，推动平台与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电商平台对接，打通片区产品走向全国市场的数字化通道。二是开展分层分类的数字技能精准培训。将数字技能培训纳入片区公共服务体系，由片区运营公司联合当地职业院校、电商平台服务商，开展集基础普及、技能提升、精英培育于一体的分层分类培训体系。基础普及类培训面向普通青年创业者，重点开展电商平台开店、产品上架、直播带货话术、移动支付等基础操作技能；技能提升类培训面向有一定创业基础的青年骨干，重点开展数据分析、网络营销策划、数字化供应链管理、跨境电商运营等进阶技能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实操演练”的方式，提升创业者的数字运营能力；精英培育类培训面向片区内的龙头创业企业负责人，联合高校开展“数字创业精英研修班”，重点培养其战略规划、品牌运营、资本运作等高端能力，并为学员配备创业导师，提供一对一的指导服务。三是推动数字平台的乡土化适配。针对部分青年创业者文化水平不高、对智能设备操作不熟练的问题，要通过简化操作界面，采用图标化、可视化设计；开发方言语音输入功能，支持普通话、地方方言等多种语言交互；保留线下服务窗口，为创业者提供面对面的操作指导等，对片区数字创业服务平台进行乡土化改造。此外，建立“片区数字帮扶专员”制度，从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中选聘一批熟悉数字技术的人员，担任片区数字帮扶专员，为青年返乡创业者提供上门指导、设备维修、问题解答等帮扶服务。

（四）构建片区品牌共治与协同保护体系，净化青年创业市场环境

区域公用品牌是组团片区的核心资产，必须着力解决假冒侵权、“公地悲剧”的难题。一是建立片区公用品牌的准入与退出机制。由片区运营公司统一注册片区公用品牌商标，制定明晰的品牌使用准入条件。要求产品必须产自片区划定的地理范围，符合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采用片区统一的生产技术规程；创业者必须加入片区运营公司，遵守利益分配机制与质量管控要求。建立严格的产品质

量检测制度，由片区运营公司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申请使用品牌的产品进行定期抽检，检测合格的产品方可获得品牌授权使用证书，并粘贴“一物一码”溯源标签。同时，建立品牌退出机制，对产品质量不合格、消费者投诉率高、违反品牌管理规定的创业者，取消其品牌使用权并作出相应惩罚。二是组建片区品牌保护联盟。由片区运营公司牵头，联合青年创业主体、市场监管部门、法律机构、行业协会，组建片区品牌保护联盟，负责品牌的日常管理、维权打假、宣传推广等工作。针对假冒侵权行为，由联盟统一收集证据，配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常态化的线上线下打假专项行动。三是推动片区品牌的协同宣传与价值提升。由片区运营公司制定统一的品牌宣传推广方案，整合线上线下宣传资源，提升片区公用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同时，建立片区品牌信用评级制度，根据创业者的产品质量、消费者评价、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等指标，对授权使用品牌的创业者进行信用评级，评级高的创业者可获得更多的宣传资源、贷款优惠、政策支持，引导创业者自觉维护品牌声誉。

参考文献

[1] 黄祖辉, 宋文豪, 叶春辉, 等. 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1): 24-43.

[2] 郑兆峰, 高鸣. 返乡创业如何影响创业者家乡其他农户收入[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5): 81-101.

[3] 魏后凯. 科学理解和把握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12): 3-6.

[4] 胡祎. 中国特色返乡创业问题研究: 框架、进展与展望[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8(3): 120-134.

[5] 郑风田. 乡村振兴战略给乡村企业带来哪些新机遇[J]. 人民论坛, 2018(17): 61-63.

[6] 郭凯凯, 高启杰. 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机遇、挑战及对策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22(2): 103-111.

[7] 韩俊, 崔传义. 我国农民工回乡创业面临的困难及对策[J]. 经济纵横, 2008(11): 3-8.

[8] 周宇飞. 大学生自主创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基于面向农村创业视角[J]. 湖南社会科学, 2010(4): 180-182.

[9] 江帆, 宋洪远. 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历史方位与实现路径[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 23-33.

[10] Timmons J A, Spinelli S. New venture creation[M]. Boston: McGraw-Hill, 2003.

[11] 杜运周, 刘秋辰, 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20, 36(9): 141-155.

[12] 王桂玲, 颜华, 朱瑜.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扎根分析[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2(3): 54-65.

[13] Coase 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2): 72-74.

[14] Lucas Jr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3-42.

[15] 申小莉. 创新网络中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小企业实证样本的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11, 29(3): 432-441+460.

[16] 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 李明轩, 邱如美,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

[17] 高鸣, 周子铭.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体系构建、关键问题与政策路径[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2(3): 37-52.

[18] 张立新, 段慧昱, 戚晓妮. 创业环境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9(1): 72-83.

（**责任编辑**：肖舒苑）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District-bas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ZHENG Zhaofeng[1], HU Yi[2]

(1. Zhejiang Province "Double-Eight Strateg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stitute,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ngzhou 311121, China;
2.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Youth returning-home entrepreneurship is a crucial approach to address the predicament of talent and industry shortages in rural area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 district-based manner, youth returning-home entrepreneurship has ushered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emerging practices and existing challenges of youth returning-home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 district-based mod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he district-based clustered development model, policy integration can enhance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ies, factor integration can enrich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regional linkage can create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joint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can optimize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 variety of new entrepreneurial forms have emerged in the practice of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 district-based wa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institutional risks caused by inaccurate and volatil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districts, unstable entrepreneurial foundations resulting from unreasonable 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s, capability constrain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district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e dilemma of counterfeiting and infringement in the use of district public brand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under the context of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moting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youth returning-home entrepreneurship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regional planning guidance and legal safeguards, innovating regional interest linkage and governance models, enhancing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and platform adaptation within the region, and continuously building a regional brand co-governance and collaborative protection system.

Key words: district-based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youth; returning-home entrepreneurship